

傳播理論研究的新方向

批判理論介紹

林文政

壹 前言

當 Bernard Berelson 在一九五九年春季號的「民意季刊」中，宣佈傳播研究正步向凋謝死亡，引起傳播界一陣恐慌。Berelson 的主要論點是：

一、傳播界的啓蒙始祖相繼謝世或離開傳播領域：李溫 (Kurt Lewin) 已逝，賀夫蘭 (Carl Hovland) 亦不久人世，拉查斯斐 (Paul Lazarsfeld) 回到數學研究領域，拉斯威爾 (Harold Lasswell) 也結束教學生涯，一時傳播界真是花果凋零。

二、傳播研究似乎已走入了死胡同，學者的研究無法證實大眾傳播效果的存在，傳播研究已失去光彩的前景。^①

實際上，Berelson 的預測並非正確，傳播研究非但沒有壽終正寢。相反的，傳播理論的發展正蓬勃發展，這是由另一支新理論取向注入了傳播研究，帶來了新氣象。

這個新理論取向是以研究者與科學，社會和政策關係，研究目標與社會問題及社會結構之關係，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策略和方法為主。

這一派為數不多，但具有高學術水準的傳播研究，起源於歐洲，尤其是英國、德國和法國。在 Berelson 寫一九五九年的文章的時候，就早已存在；但在一九六〇年末期，才以「批判的傳播理論」為名，在歐洲北部傳佈開來。

這一個新理論學派為大眾傳播理論，帶來極大衝擊，也帶來極大的論爭，我們可由普爾 (Ithiel de sola Pool) 和施勒 (Herbert I. Schiller) 在一九八一年夏季號傳播學刊 (JOC) 的座談中，看到兩個不同傳播觀點，導致研究取向，觀察角色，所持見解，都是迥然不同。^②

兩種理論的激盪，更明顯地展露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對於「新聞自由流通」和「國際資訊新秩序」的論戰。這個論戰不但在大眾傳播界頗具意義，對國際政治的衝擊，亦導致美國退出教科文組織，其影響不可謂不鉅。

傳播理論非但沒有凋謝死亡，反而更生氣蓬勃地茁壯，研究的層面更寬廣深入，本文無意指陳主流理論和批判理論孰佳，而僅就批判理論的淵源、內容、重要概念及兩種理論的差異比較，予以介紹。

貳 批判理論的源起

批判的傳播理論是跨科際的社會科學。它結合了許多其他學門（如政治、經濟、社會、人類學和藝術等），就因為它的背景十分複雜，它的範圍從狹義來說：是以對現狀提出辯證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為主。由廣義來說，批判理論並不說明或覺曉其為新馬克斯主義者的本質，只要是從系統情境中，對矛盾現象提出質疑批判者均屬之。在這定義下，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肯尼斯(J.M.Keynes)，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等，均屬於批判理論者。③

批判理論是以保持批判意識為其主要重點，其中以法蘭克福學派為其重要的理論淵源，而由其社會學及政治學擴展到其他學門（包括傳播理論）。因此，了解法蘭克福學派（又稱批判理論學派）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批判的傳播理論的發展過程。

「法蘭克福學派」通常是指一九二三年在法蘭克福成立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如荷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和阿多諾(Theodor Adorno)等人的集體思想，他們集合了當時威瑪德國的激進知識份子，包括許多前共產黨員。他們以保持馬克斯的批判意識為職志，對當時社會提出尖銳的批判。

由於強烈的激進色彩，和許多份子都是猶太人，當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取得德國政權後，他

們就被迫轉到紐約，附屬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系，一九三〇年荷克海默繼任卡爾葛倫柏格擔任所長。一九四九年大戰結束後，立即將研究所遷回法蘭克福，而馬庫色仍留在加州。荷克海默之後，所長之職位由阿多諾繼任，直到他在一九六八去世為止。

法蘭克福學派起源於一九三〇年代，盛行於一九六〇年代，他們的理論受到三個主要的歷史經驗所影響：

一、他們對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未能擴展到西歐而感到遺憾，但也為史達林統治勞工階級的革命浪潮失敗，而感到沮喪。

二、對法西斯主義的深刻而持續的經驗，不斷出現於他們的著作，直到戰後許久，才得平復。

三、他們對戰後西方的政治穩定表示深為關切，並試圖描述和解釋由其產生的意識型態轉變。

④

法蘭克福學派興起於三〇年代，當時歐洲，正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面臨自我毀滅的趨勢，傳統自由民主政體，似乎無法處理經濟及社會問題，於是兩種對立勢力於焉興起，一是法西斯主義，一是歐洲共產主義。批判論者對現存的社會體制和左右激盪的力量，都予以否定，而其所提出的反命題 (Antithese)：「為黑格爾 (Hegel) 的辯證法，作為反對傳統理論的方法論之工具；一為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抨擊資本主義弊病的武器。這種對兩種社會體制的批評，呈現於馬庫色的「蘇聯馬克斯主義的社會理論」，對蘇俄社會體制，嚴加批評，認為共產主義是嚴厲的，極權的，全面壓制為基礎。在他另一本著作「單面向人」(One dimension man)

則對美國資本主義，提出攻擊。⑤

一九六五年美國學生運動興起，這些對現存社會體制不滿的學生，尋找理論依據，而法蘭克福學派獨具的批判意識，正符合了他們反叛心理，使得批判理論廣為流傳，而且其層面亦由社會學，擴展到政治學、哲學和大眾傳播等領域，有關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傳播理論的直接影響，我們將在稍後討論。

當然，批判的傳播理論正如史萊克(Jennifer Slack)和亞勒(Martin Allor)所認為，並非僅有一種型態，也並非完全出於法蘭克福學派，或者以一種簡單的單層面二分法所能定義。他們認為在其批判理論分支理論中，如法蘭克福學派，政治經濟理論，馬克斯社會學，依附理論，文化研究和大陸派哲學等，都存在若干差異。⑥

叁 批判理論的內涵

達拉斯·史密斯(Dallas W. SMYTHE)曾經提出三個分辨批判和管理(Administrative)理論的差異：(1)研究問題的選擇。(2)研究運用的研究方法。(3)學者對研究結果分析時，所採用的意識觀點，無論是對現存的政經秩序的批判並使之改變，或者是保衛並加強它。⑦

以下我們將依據史密斯的類別，對批判理論的內涵，進行概略的簡述：

一、研究問題的選擇

(一)意識型態 (Ideology) 許多批判論者的研究探討，都是根源於意識型態的衍化，而發展出其各自的理論架構，因此了解意識型態在傳播批判理論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對我們大有俾益。意識型態，根據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的定義是：「相對正式和明白的意義、價值、信念的系統，或可以抽象的認為是一種世界觀或階級觀。」^⑧而亞瑟士 (Althusser) 認為是一種「個人對其所存在真實情況的假想關係」。他認為意識型態管理人們如何認知世界和自我，它控制了人們所看到的本質和外表。^⑨

班乃特 (Tony Bennet) 指出意識型態的關切重點：

一、意識型態意含了有關表示意義系統的社會決定論。馬克斯提出社會知覺的明確形式，係結合了法律、政治的關係，建立了一上層結構，但此建基必須符合於生產關係的下層結構。

二、意識型態的概念常帶有扭曲的意涵。意識型態為一過程，此過程以我們不能立即察覺的方式塑造我們的知覺。由於傳播系統為控制階級所主宰，因此人們的知覺便為控制階級以非抽象的方式所扭曲。

意識型態的觀念提出了三個與媒介有關的主要觀點：

一、第一個與透過媒介運作所為的社會控制本質有關，其主要問題在於媒介所有權的結構，以

及統治階級透過媒介運作所為控制的方式及範圍。

二、在技術上，傳播媒介如何取代意見系統，而達到「誤導」(misrecognition) 的效果。

三、媒介在構成社會的經濟、政治、意識型態階層間彼此相關，佔有一重要的地位。^⑪

由於意識型態與意見系統的傳送有關，此並非抽象的過程，而係由控制經濟的階級，經由心靈生產 (mental Production) 工具的控制，以具體方式來影響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批判論者有關「上下層結構」的假說。

新馬克斯論者認為，經濟是社會的下層結構，其他的法律、政治、宗教、教育、傳播等均屬於上層結構。上層結構受下層結構影響；下層結構決定後，方能決定上層結構。

有些學者認為，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的關係是最主要的問題；但有些學者却認為這種暗喻是無用的。一般持平的看法，認為上下層結構的分析是有其價值，只要不將其視為明顯的二分法或視其為簡單的因果關係。

馬克斯和恩格斯曾指出，擁有任其使用的物質資源工具的階級，也就控制了心靈產物的工具。這種物質和資訊分配不平衡，引伸出批判論者有關「主宰」(Domination) 的論點。

「主宰」是統治階級將其文化，知識和道德觀直接加諸於其他階級。因此「主宰意識」(dominant ideology) 是統治或主宰階級的意識型態；「虛假意識」(False ideology) 是指一個意識型態無法和其階級連繫。因此在他們看來，在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而言，主宰意識是一

種虛假意識，因為它並未能反映出他們的利益。¹²

「主宰」的觀點，並非代表絕對的主宰或控制，而是以一個更精細動態的現象，來認知設限於思想和行為的變項。不但告訴民衆應想些什麼，也影響民衆能想些什麼。

(二)對工具理性的批判，美國學者通常對科技工具的發展抱持樂觀的觀點，他們認為只要良好的管理規劃，科技可爲人類謀福利，這類學者由於對傳播科技採「管理」(administrative)的態度，因此有人稱之「管理理論」，而以波爾(Ithiel de sola pool)爲代表；而以韋伯所鼓吹的技術理性，對物質的生產及交換，講求方法，科學及充分發揮效能所建立的器具之操作與控制，以合理的結合人與技術工具之關係。

但批判論者引用海德格學說對工具理性進行批判：「在現代技術內所含有的力量，決定了人與人的關係，在存有的一切範圍內，人類總是被技術器具或自動化機器的力量密集安排。」

施勒進一步指出，科技在社會和制度問題上，並非全然的自治與中立，而是以維持現有社會體制而服務爲其目的。¹³

史密斯(Dallas W. Smythe)同時指出：「科技是一種有害的迷思」，這個迷思是由幾個因素構成：1.行政機構（私人、公共）；2.科學；3.資本；4.工程師所創造的工具和機器；5.意識型態；6.宣傳。型塑民意使大眾能接受此迷思。他說科技迷思之目的，即爲維繫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而爲其支配之工具。¹⁴

因此，施勒主張打破以媒介製作人，尤其是廣告主的利益爲主之傳播閱聽人研究，建立一個

新的「受眾中心」的理論，研究媒介資訊的來源和生產，以改變媒介科技與閱聽人的角色和關係。¹⁵

(三)對交易理性的批判，批判論者同時對資本主義體制下，媒介運作受到交易理性的絕對影響感到不滿。交易理性即透過市場功能，不僅能滿足經濟生活中的供給與需求，同時也能合理分配資訊和財富。

批判論者如莫道克(Graham Murdock)即指出，傳播媒介生產的是一種特殊商品；一方面，它和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可在市場上出售；另一方面，它又提供現代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印象。因此它扮演塑造社會知覺的樞紐角色，這是經濟與文化力量結合的特殊關係，形成學術和政治所關切的論題。¹⁶

他們所提出的質疑，是媒介由誰來控制，並為誰的利益服務？資本主義者以其優越的資本和技術，透過廣告，控制媒介的所有權，並有權決定媒介的內容，通過媒介的訊息推銷其產品、利益，並傳佈其意識型態，以維持其經濟及文化獨特利益。這種以交易的利潤動機壟斷媒介內容的做法，完全抹殺了大眾傳媒介應為社會公器，應為社會大眾的利益的功能。

美樂地(William H. Melody)和馬謝(Robin E. Mausell)指出，批判理論對交易理性的抨擊集中於1.權力的集中。2.主宰和依附關係的特性。3.鉅大利益的誘因。批判理論的前提，就是希望藉由問題的提出和集中研究的努力，改變政治和經濟系統關係。¹⁷

(四)社會和歷史情境的多重決定論。

批判論者，經常批評主流研究者的行為實證研究的弊病，即是試圖孤立個人的行為，將個人抽離於社會網絡和其社會歷史情境，產生如艾文(Stuart Even)所稱：「實證主義將事實和現象抽離於其情境，導致歪曲了真理。」¹⁸

批判理論視傳播在生產和社會複製中的兩大功能：

1. 視傳播為一般社會關係所必要的潤滑。

2. 視其為修正、改變生產與消費狀況的必要社會關係。要了解大眾媒介在社會系統的運作，必須先明瞭其歷史環境及政經結構和制度的情境，這些歷史和社會，政經及意識型態情境，不僅塑造同時直接在媒介及社會內部生產，分配和接收等過程運作。¹⁹

換言之，我們無法孤立於社會和媒介的總體情境（不管是立即或歷史情境），來了解社會與媒介的運作。艾文亦同意，「傳播研究應發展更多的社會和歷史的觀點，而非將媒介閱聽人的關係，由他們所存在的世界抽離出來，他們必須更活潑地存在於他們的世界和歷史之中。」²⁰

塔克曼(Gaye Tuchman)也強調社會情境與澄清文化生產觀點的本質和角色，對批判理論的重要性，她並描述歐洲研究對美國研究的貢獻，即是促使美國的「理論和實證分析能納入其社會情境」，而非落入「一種狹窄，直線和因果的模式。」²¹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了解何以美國主流研究的最受批評之處，即是大眾傳播研究「真空化」(decontextualization)，研究未考慮社會和歷史情境，產生了嚴重偏見的結果。

理論模式的實質內容與對真實本質的假設，影響了研究的結果，內容與假說反映特殊特性的

價值與引導研究問題。批判理論所提出的假說與問題，所展現的特殊理論模式，我們將稍後介紹。

二、研究運用的研究方法

批判理論與主流研究另一個迥然不同的特點，就在於兩者所使用的方法，前者是一種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研究方法，而後者則以哲學的和方法論的研究為主。

歐洲的傳播研究特色：22

(一)以總體論或系統論的觀點研究傳播：將傳播組織與過程，置於歷史與社會情境中研究，認為對事實的解釋應以總體為對象，因為總體並非單純的事實或個別的現象，因此，只從個別的現象和事實絕對無法檢查整體的真象。

他們強烈地反對越簡單越合乎科學法則，而將研究建立在支離破碎的細小問題上，他們主張應對事實進行全面的觀察，與統合關聯性的思考，進行個案的研究。他們認為數量化的方法所涉及者不僅是推論效度的問題，而且牽涉到人的尊嚴。

(二)以混合的研究方法，從事同一研究，如紐曼 (Noelle-Neumann) 在一九八〇年的研究，就結合了內容分析，小組研究 (Panel research)、同時調查在特定地點的傳播者的特定事務。這種方式，從負面來看，泯滅各種研究方法的界限；從正面來看，研究的問題可透過混合的方法，得到答案。

(三)零星的閱聽人研究，如成人收視型態的研究，使用與滿足的取向等，但是在歐洲對閱聽人層面的研究，缺乏相對一致和累積的傳統。

(四)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分析不是要產生任何法則，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歷史，事物或行為，每個定義各有不同，而文化研究視人類行為為一讀本，這讀本由一系列的符號、說話、寫作、姿勢組成，而都含有當事人本身的意義。文化研究即是將這些意義與生活和經驗聯結，以建構一種讀法。文化研究結合了觀察法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與實驗法，語意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等

。 23

批判理論的研究是一種質的研究，它的目的即在在兩個矛盾的力量衝擊下粉碎誤導所呈現的平衡與和諧，這個衝擊包含了一個整體分裂為二的力量，和一個跳動，快速與質的改變，一般研究者無法處理這種現象，就稱之為混亂(chaos)或革命，而變動的力量可來自外在環境的限制，也可能出於內在的刺激引發變遷的過程，這種以變遷的衝突為主要的研究觀點，稱之為辯證的研究方法。

相對於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個體行為改變，媒介效果，勸服效果的美國主流研究，它有一套嚴謹的「科學方法」，運用周密的邏輯和實證的測試，刪除所有暗喻式的觀念。

但誠如馬士可(Vincent Mosco)所指出：「因為它是可測量，可量化的真實，從歷史持續到現在，這些因素也將會將現在推到未來」因此馬士可指控絕對的實證主義支持維持現狀，而使媒介制度有一種虛假的自治並隱藏其力量。而使其維持穩定與平衡，這是這些研究者視為自然的

狀態——一個已建立的秩序；所以又稱為管理的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

24

三、學者對分析研究結果，所採用的意識觀點

批判理論的認識論 (Epistemology) 在批判研究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如史萊克和亞勒所說的「社會力量的政治問題與因果的認識論問題相連結，形成了獨特的批判理論。」。他們認為政治是社會權力的運作，而所有批判關切重心都集中於傳播如何有效運作社會的權力，權力的運作必須決定於社會的過程與制度；權力也由個人運作，但個人運作權力必須受到結構性決定的限制。

批判理論在內容與推論上，都與認識論、政治，控制知識的方式（權力與知識的關係）是運作社會權力的基礎。他們提出認識論，是因為批判理論比管理理論更能挖掘知識的本質，尤其是簡單直線因果的行為主義者的因果與假說，馬士可認為實證主義錯誤地假設，研究者應與研究的目的分離。

批判論者同意個人參與的承諾，而與古典實證主義者標榜的科學追求的價值中立對立，他們認為「不含價值判斷；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而批評實證主義是一種累積的知識形態，能用以對事實作最詳盡的描述，而其建構則是為現存秩序而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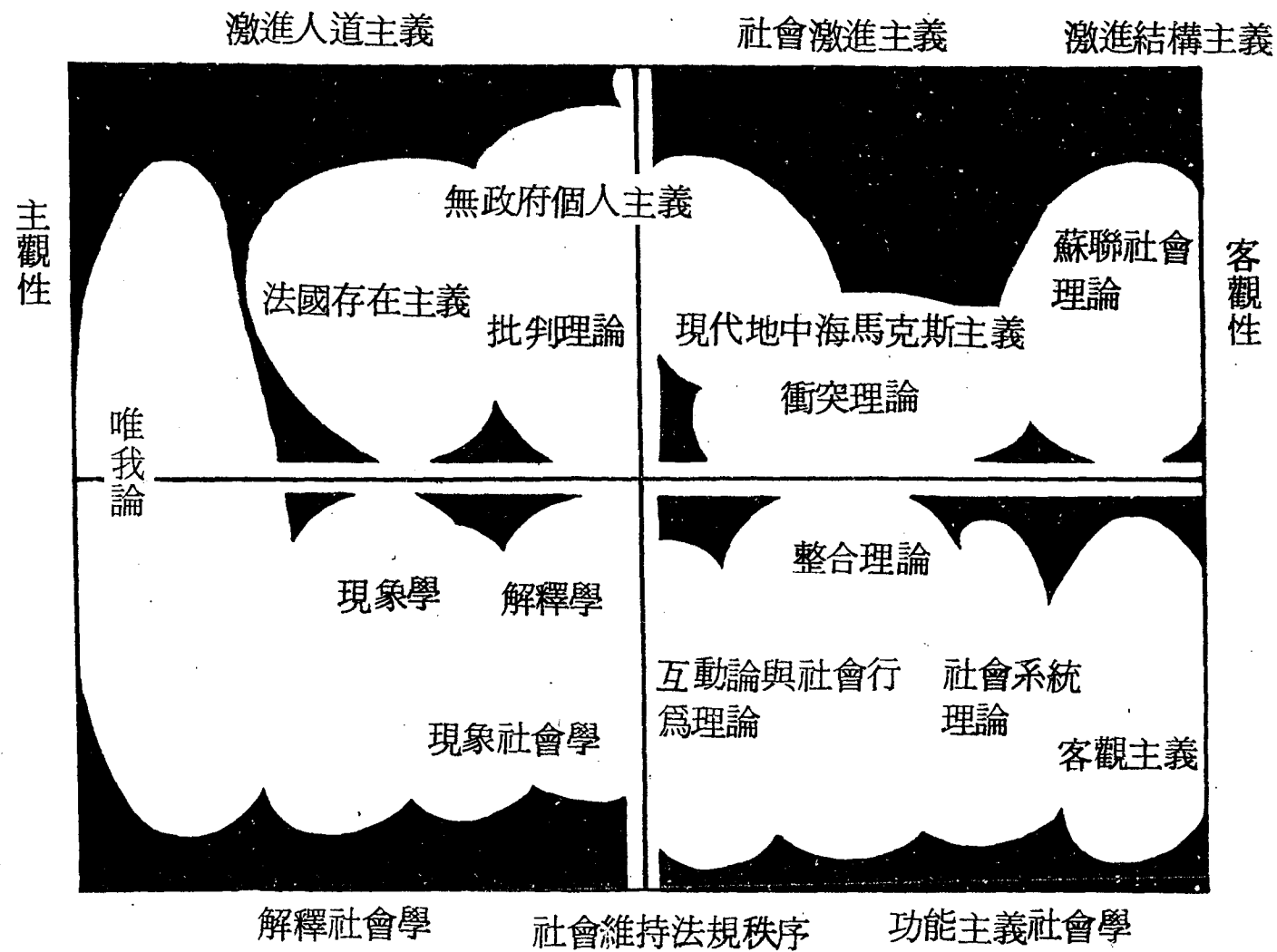
馬士可認為批判研究的目的，是為社會變遷為主，因此不以描述現象或依價值解釋為足，而依民衆自我決定而解放。批判論者應無畏地承諾人類解放的價值。艾文也同意批判理論肯定變遷

，但變遷的來源必須操諸人民之手，而學習自我表達思想，知識和懷疑，使人們能擁有力量。這樣的意義，遠高於科技與學術爭論的基地。²⁵

施勒也認為學術應該為社會指引一個目標，應該協助改變世界。傾向變遷並非代表非理性或非邏輯，學者不應從事漫無目的的工作。此論調正好與實證主義相反，波爾強調價值中立，學者任務是分析現象，澄清事實，促進了解，學者若自認為有義務為某學說鼓吹，可能就會因為政治偏見而混淆了方向。

在主觀與客觀層面，羅森格林 (Karl Erik Rosengren) 引用布瑞兒與摩根 (Burrell & Morgan) 的型態 (tyology) 來說明，如下圖，以主觀、客觀導向和社會學的法規秩序與激進改變為依變項，區分各社會科學所在區位。

這個主觀、客觀的層面，涵蓋了四個有關社會科學本質的相互假說：在本體論方面，是現實主義與名類主義；在認識論方面，是實證與反實證主義；在人類本質方面；是決定與自願論；在方法學上，是數據統計 (monothetic) 與意識表象 (ideographic)。在法規與變遷層面，包括了維持現狀與激進變遷，共識與主宰，團結與解放，實際與潛在。



肆 批判傳播理論之分支學派

一、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者，鑑於馬克斯所預測的階級革命，社會變遷明顯失敗，而欲解釋此種失敗的因素，必須從上層結構著手，尤其是透過語言溝通的方式解決，而反對馬克斯經濟變遷的歷史過程。

另一方面，全球性商業化與大眾文化，是壟斷的資本主義成功的主因。大量生產貨品，服務和觀念的整套系統，同時也推銷了資本主義的思想和制度，伴隨而來的是工具理性，交易消費，短期滿足和無階級的迷思。貨品 (Commodity) 是此過程的主要意識工具，似乎精緻藝術，甚至批判和反對的文化產物都可標上價格，在市場上出售，而完全喪失了批判的力量。

法蘭克福學派者，既反對共產主義的作為，也抨擊資本主義的弊病，馬庫色將此社會的「單面向」(one dimensional)，歸因於文化事業的推波助瀾，他認為媒介與社會的政經勢力結合，遏止了改革的有力機能。

哈伯瑪斯為取代交易理性和激進的經濟改革，建構一套理論，使其成為當前社會正當性的基礎，他所提出的理論就是溝通傳播。

他認為人們可透過彼此在互動規則下，以自由選擇的方式進行溝通；傳播可分為四個階層，人們可選擇適當的方式，而達成結論，它並非是傳播者恣意的表示，而是雙方互相承認及接受的意願，社會建制及規範，因此也就得到了正當的基礎。因此，他主張「語言就是一種支配及社會力量的媒介」，甚至「語言是社會的建制」。²⁷

二、政治經濟理論

政經理論較重視經濟結構，而較不重視媒介內容的意識型態，而將意識型態植基於經濟結構，雖然它與政治系與有密切關聯，但實證研究的焦點，似乎集中於所有權結構與市場力量的運作。

社會的媒介系統產生訊息的先決條件，是在擴展市場的壓力下，不同內容的交換價值和媒介所有者與決策者的經濟利益為優先。媒介運作所產生的利潤，最後可能導致獨佔的傾向及橫向、縱向的商業整合。

這種傾向促使獨立的媒介日益減少，導致市場集中，以避免風險，為迎合這種趨勢並保證利潤最大的原則，小群閱聽人的需要勢必將被犧牲，莫道克和高丁就曾批評：

金錢運作的潛在邏輯，鞏固了已在媒介市場佔有地位的團體，而排除了那些缺乏資本為後盾的人們，使其不能成功地進入媒介市場。因此媒介充斥了那些最不常批評現有社會財富、權力分配的人之聲音；而欲向此不平等挑戰的人，却無法透過媒介，表達他們不同的意見。²⁸

此理論最大的優點，在於能對市場決定的說法，進行可測試的實證假設；而其缺點則在於公眾控制下的媒介因素，很難從自由市場的功能來解決。

三、霸權理論

霸權理論以上下層結構的觀念，來說明意識型態及其本身表達的形式，記號的方式，構成意義及形成意識或侵入其他階級意識的機能，而較不重視經濟、結構決定的因素。

霸權理論以「主宰」的觀念，說明主宰階級如何透過下層結構，影響上層結構的運作，而將其意識型態加諸於其他階級。

此理論與政經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承認較大幅度意識型態的獨立性，而非完全由政治經濟結構所決定。

葛瑞吉 (Gramsci) 曾對霸權作了如下的解釋：

在任何時期、任何階級，總有一中心的實踐、意義與價值體系，可稱作優勢體系，此體系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經過組織且被生活出來的，所以不只是意見之操縱。它是實踐與期望的全體；是資源分配；是對人及世界之性質的一般性瞭解；是一組意義和價值，落實於生活時，相互肯定，彼此標榜；是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現實感，具有絕對的權威，因為跨越此現實感，大多數的成員在大部份的生活領域中，將無立足之處。

亞瑟士 (Althusser) 和普蘭滋士 (Poulantzes) 認為，資本主義的關係，其複製(reproduction)與正當性，都多少必須經過勞工階級的承認，爲了實踐此一目的，須藉由語意學和結構

分析，以揭示其潛在結構中的意義。②9

四、文化研究③0

文化研究者的傳播研究，視傳播為一種儀式 (ritual)，將傳播視為一種創造、修飾、改變或共享文化的過程。

文化研究批評了美國研究，其研究對象只是由大眾媒介產生的，但這只是研究的單一面向，而忽略了人類學、文學使用的批評、闡明、及比較。霍爾 (Stuart Hall) 認為「文化」一字就人類學的觀點，導向對整體生活的研究，而「傳播」只是研究生活的一個片斷而已。

因此，文化研究的範圍包括：人類學的儀式和神話，文學批評的藝術及文學。在文化研究的傳播目的是持續，整合社會；創造、表現和頌揚共享的信仰和意義，以及履行神聖的儀式，團結成員。

文化研究關心的是文化與社會，表達形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因此探討的問題是：表達形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表達形式的歷史變遷，形式進入主觀意義世界的過程，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在創造共同文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以上討論的分支理論，政治、經濟理論偏重組織原因，霸權理論側重訊息；文化研究兼重訊息及大眾互動關係，嘗試解釋存在媒介間選擇的方式。但並非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是批判論者，一個廣泛的共見是對社會更廣泛的結構和特殊歷史情境的探討，這對瞭解媒介如何運作是必要

的。³¹

伍 批判理論與經驗主義的比較

由於批判理論與經驗主義兩者的理論取向分歧甚鉅，造成雙方學者持續的爭辯，而莫衷一是，究竟這兩派理論有何差異，這是許多研究者所感興趣的。

除了本文前述，史密斯 (Smythe) 的列舉的三個分辨此二理論的差異：(1)研究問題的選擇；(2)研究方法運用的不同；(3)對研究結果分析觀點的不同。

此外羅吉斯也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圖表，以區分批判理論與實證主義的不同。這一個非常簡單的二分法，雖然十分粗糙，但却有利於研究者迅速抓住兩者差異的重點。³²

經驗主義 Empirical	批判理論 Critical
量化經驗 quantitative empiricism	強調哲學 philosophical emphasis
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馬克斯主義 Marxism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集中於傳播中更廣泛的社會結構情境 focus on the broader social structur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強調誰控制大眾傳播系統的問題 emphasis on issue of who controls mass communication system

由於圖表中的內容，我們已在前面討論過，因此不再重覆討論，但這個圖表却也受到其他學者的反對，如史萊克與亞勒就舉出下列原因反對：³³

一、只孤立兩個理論的特殊變項，但未發展出必要的且足夠的方法來區分兩者，且這些名詞也未必衝突，如研究廣泛社會結構情境傳播，也可能運用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而研究閱聽人，亦可能研究廣泛的社會情境。

二、在個別的類目中，在批判和非批判的實際研究中，這些名詞並非在實際上互斥，如批判研究未必就是哲學性的，而數化的經驗主義也未必強調效果。

三、傳播的研究，如何根據以上圖表，進行分類，涵化分析 (Cultivation analysis)，似乎符合上述兩種類目，而民族誌學 (ethnographics) 則似乎兩者都不適合。

陸 批判理論之批判

雖然批判傳播理論，席捲了歐陸大眾傳播理論的思潮，但由於它在本質上的反動對立特性，使得它在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一直飽受爭議，下列的論點大致反映了傳播學者，對批判傳播理論的批判觀點：³⁴

一、批判研究是偏狹且負面的：波爾認為「它是陰暗且負面的研究」。而蘭斯 (Langs) 和布勒姆 (Blumer) 指出：「它偏執地只關切傳播帝國及傳播為何人的利益服務。」而且「它在倫理上是混淆的，在政治上則是不實際的。」蘭斯並指責批判研究反對實證研究的主張。

二、批判研究是偏見的：批判研究者對政治和道德的承諾，而使他們偏向主觀參與，主張社會的改革變遷，而成新聞靈魂的裁判者，這些新馬克斯主義者，使馬克斯主義改頭換面。

三、批判研究在方法論上和邏輯上是非科學的：

(一) 批判研究逃避測量，不符合實證的因果，推論和解釋的條件。

(二) 批判理論假設那些無法展現的因素，而且只能顯示現象，而無法測試觀念。

(三) 批判研究常犯「區位學謬誤」(即由某一層面的觀察錯誤地推論其他的行為)，批判研究常個體行為一般化到整體行為，或由整體行為一般化到個體行為，也經常由階級現象一般化到其他層面。

(四) 批判研究常含混的，不知他們是由測量個人以推論社會系統的特性，或由測驗社會系統以推論個人，而其用詞常使用「有點」(something of a) 或「有時」(often)，而非較明確的表示。

四、批判研究基於對現有體制的反動，而提出體制的問題並建議改變，但未能提出如何建構一個更好的體制的具體建議，而有「只有哲學外觀而無實質，只有意識型態而無本體論」之弊端，而欠缺說服力。③5

儘管批判理論受到學者們的如上的批判，但批判理論對大眾傳播理論仍有其貢獻：③⑥

一、批判研究是不同而且是創新的：它以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檢驗不同的問題，尋求替代的模式和新典範。

二、批判理論強調許多管理研究所忽視的問題：

(一)社會權力的來源與運作，及媒介權力集中的弊病。

(二)透過媒介控制和主宰，造成依附和受壓迫人們無法表達意見，這是批判研究的關切重點

。

(三)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對各層面的影響，如生產事業的結構，讀本的意識型態，消費者動機等。

(四)傳播不應孤立於社會情境。

(五)由認識論重新檢視因果，客觀性與知識的結構，都是批判研究的工作。

三、批判研究者，體認其主觀的承諾，他們主觀的對維持現狀提出批判，並鼓吹社會變遷，協助人們了解目前情境和何種可能的變遷，使他們擁有自決的權力。

柒 結語與展望

不管批判傳播理論與管理傳播理論之間的爭議是如何分歧、激烈，本文的目的並非說明那一

種理論較具優越性，而是闡釋二個理論取向都有其獨到之處，也各有其缺陷，在不同的層面，以不同的方法，涵蓋不同的問題。

因此，爭辯二個理論的優越性，無疑的是徒勞無益的，較具建設性的做法，即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一道橋樑，使兩種理論能建立一種相容互補的關係，各取所長，各補所短，使研究的過程能更趨周密，層面更趨廣濶。

註 釋：

- ① Berelson Bernard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 Spring 1959, pp 1-6.
- ②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Herbert I Schiller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C, Summer, 1981.
- ③ Dallas W. Smythe and tran Van Dinh On Cr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 A New Critical Analysis " JOC, Summer, 1983, pp 117-
- ④ Tony Bennett "Theories of the Media, Theories of Society" Abridged version in Curran M. and Wollacott J (1982)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C'SM) Lodon, Edward Arnold, p 31-55.
- ⑤ 同註四。
- ⑥ Jennifer Daryl Slack and Martin Allor "The Polit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constituents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C, Summer, 1983. p 208-218

- ⑦ Dallas W Smythe "Newdirections for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ch" Media Culture & Society (MCS) Volume No3. July, 1984.p 206-217

- ⑧ Samuel L. Becker "Marxist Approaches to Media Studies : The British Exper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84, p66-80.

- ⑨ 同註八。

- ⑩ 同註四。 P47-p48.

- ⑪ 同註四。 P49

- ⑫ 同註八。

- ⑬ Herbert I.Schiller "Critical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Age "JOC, Summer, 1983. p 249-258.

- ⑭ 同註七。

- ⑮ 同註十三。

- ⑯ Graham Murdock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CSM, p118-p150.

- ①7 William H. Melody and Robin E. Mansell "The Debate over Critical vs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 Circularity of Challenge" JOC, Summer, 1983, p103-116.
- ①8 Sturat Ewen "The Implications of Empiricism" JOC, summer, 1983, p219
- ①9 同註八。
- ②0 同註十八。
- ②1 Gaye Tuchman "Consciousness Indust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JOC, Summer, 1983. p330 .
- ②2 Jay G. Blumle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urope : Some origins and prospects" MCS. 1980. p 367-p 376
- ②3 James W. 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e studies : An American View" CSM, 1982.
- ②4 Vincent Mosco "Critical Research and Role of labor" JOC, Summer, 1983. p237-248
- ②5 同註中國。
- ②6 Karl Erik Rosengre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One paradigm of Four?" JOC, Summer, 1983 p185-208.

- ②7 Richard L. Lanigan "A Critical theory Approach"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Dan. D. Nimmo & Keith R Sanders. p 141-167.
- ②8 Graham Murdock and Peter Golding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urran et al, 1977, 12-43.
- ②9 同註八。
- ③0 同註廿三。
- ③1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1982, p 51-70.
- ③2 Rogers E.M. "The Empirica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M Burgo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5. New Brunswick N.J.: Transation books, 1982.
- ③3 同註六。
- ③4 Michael Real "The Debate on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JOC, spring, 1 spring, 1984: p 72-80.
- ③5 同註十七。
- ③6 同註卅四。

